



武术近代化嬗变的先锋实验:1901-1937 年间上海的武术活动

匡淑平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将近代上海武术放到上海城市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立体的、多层面的研究,展示近代上海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精武体育会通过组织形式、传授方式、传播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举措,成为了融合中西体育之典范团体。在精武体育会的创新引领下,近代上海创建了近 100 家武术社会团体,从而全面推动了武术从传统的武举制度向竞赛式体育法系的转变。上海借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以出版书籍、创办期刊等形式促使武术传播方式的近代化发展。上海新型市民群体的形成,市民意识的确立,市民大众对体育的渴求,也推动了上海近代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对外开埠城市,中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体育从互识、互证进而逐步实现互补与互融。近代上海武术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直接碰撞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成的,是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产物。

关键词: 现代化转型;近代上海;体育史;武术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3-0028-06



Pioneering Experiment in Wushu Modernization: Wushu Activities in Shanghai during 1901-1937

KUANG Shuping

(Publicity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faceted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modern Shanghai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volution of Shanghai's urban modernization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logic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tries to demonstrate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wushu in modern Shanghai. By a series ways of reforming measures on organization mode, teaching method and transmission means, Chin Woo Athletic Federations succeeded in becoming a model society that integrated Chinese sports with Western sports. With the innovative guide of Chin Woo Athletic Federation, nearly 100 wushu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which started a comprehensive transition of Wushu from the military official selecting institution to modern competitive athletic law system.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city's status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Shanghai booste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wushu transmission by means of publishing books and founding journals. Other element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Shanghai new citizen group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public thirst for sports also enhanc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in Shanghai. As one of the first ports opened to foreign traders, Shanghai witnessed the steps of mutual recognition, mutual verification, mutual complement and mutual amalgama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Modern Shanghai wushu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direct collision with the Western sport culture 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sports and Western sports.

Key Words: modern transformation; modern Shanghai; sport history; wushu

武术是产生于中国古代的一种民间格斗技艺,又称武艺。与古代军队的作战技术有很深的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雏形,经过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成以套路、流派和内功为标志,融技击、健身及表演为一体的民间武术体系。民国时期称为国术。1901 年至 1937 年是上海文化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的武术活动也开始得到西洋体育法系的过滤。武术的组织、赛制以及人

员配置、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古典武术在上海这块华洋杂处的城市得到了先锋性的质变。

1 从武举制度向竞赛式体育法系的转变

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时,增设武科,通过考试制度来选拔武官,由此建立了长达千年的武举制度。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剿清”、“灭洋”的口号对清

收稿日期: 2015-12-26

基金项目: 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YS072)。

作者简介: 匡淑平,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体育史和体育文化传播。Email: kuangk@sus.edu.cn。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宣传部,上海 200438。



政府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清政府禁止民间习武,一度造成武术不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武举考试,松江府在最后的乡试中共录取武童298名,其中上海76名。清朝政府每3年举行一次的武艺科举考试就此中断。从此以后,武术作为一种选拔军事人才的方法遭到废黜。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基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强种强国的内在诉求,武术融入近代化的社会洪流中。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武术变为国术,武术在融会中西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转型发展。“嗣渐多趋重我固有之武术。而强民主义,始得倡行无阻。各名流或组织武术机关,造就武术教材;或汇集各界人事研究武术;或著述武术专书;或编辑武术杂刊……而军警或以为正式体操,或以为普通运动。各男女学校,或列为正课,或列入课外。”^[1]在爱国仁人志士的推动下,武术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内容,一些武术家也开始注重武术教学的研究和总结。社会武术团体以新的形式集结,武术的评审和竞赛体系也规范化推进。

1.1 中西体育融合之典型——精武体育会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冬,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当时的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蔑称华人为“东亚病夫”。此举引起沪上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此后,同盟会骨干、爱国志士陈其美及同盟会会员农劲荪等人共商邀请武林豪杰来沪,打败奥皮音。众人一致赞同农劲荪北上邀请霍元甲来沪比武。1909年12月下旬与1910年4月,霍元甲两度应邀赴沪比武,结果奥皮音临阵脱逃、失约未到。此后霍元甲名声大振。为留住霍元甲,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民族体育,陈其美等人经过商议,决定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主持武术技击训练并习军事^[24]。1910年6月14日至26日,在《时报》上刊登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广告,据资料记载,中国精武体操学校成立日期是1910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3,4],1910年6月至8月第一批入会共73人,陈其美亦为首批学员,精武体操学校开办之初,陈其美、农劲荪等也常来会指导。精武体育会成立初期的宗旨是“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对于武德,则在“精武之真精神”中提到“儒之宗旨为克己,佛之宗旨为平等,耶之宗旨为博爱。克己也,平等也,博爱也,儒佛耶之真精神也,今观于精武会员,实能融会贯通无可偏驳”^[5]。这说明其宗旨依据于东方文化的传统,也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霍元甲不久病逝^[6],接替其管理的卢炜昌、陈公哲、姚瞻伯(人称“精武三杰”、“精武三公司”)等都受了新式学校的教育(卢炜昌毕业于上海汉堡黎英文书院,陈公哲学习于复旦大学),他们自幼接受了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了西方文化后,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而使精武体育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变革中实现了中西方体育的融会发展。

1.2 精武体育会的变革举措

1.2.1 武术组织形式的创新

精武体育会变革的举措之一是抛弃派系,各流派和平共处,形成武术界大团结的局面。由于武术发育于交通

不便、相互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许多派系,而各派之间,相互封锁,甚至视为仇敌。这现象已成为中国武术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7]。精武元祖霍元甲在创会之始即指出武术门派固疾,“原来武术界,传承各宗其宗,以相仇敌,莫知大体”^[8,9]。精武会成立后,本着各派同源、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武术于一炉的宗旨,荟萃了陈子正、赵连和、罗光玉、张富猷、陈维贤、孙赞轩、孙玉峰、吴鉴泉等来自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知名拳师于旗下。形成各流派拳师相互观摩、互相砥砺、优者以勉、劣者以奋的,从未有过的武术和谐发展新风尚。据统计,精武体育会中黄河流域派技击术:拳术74种,兵器92种,空手入白刃类6种;长江流域派技击术:拳术25种,兵器19种;珠江流域派技击术:拳术7种,兵器10种等^[10]。不同地域的各种拳术、套路多达近300种,为使各派融合贯通,精武体育会组织人员整理出10种基本套路,称“精武十套”,作为最基础的训练。精武体育会的做法,对于当时分散的武术界来说,起到了团结和推动的作用,使传统武术向近代化靠近了一步。

1.2.2 武术传授方式的创新

精武体育会变革的举措之二是传授方式近代化,排除武术界的迷信色彩。由于武术长期受宗教、迷信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常有迷信的传说和荒诞的神话结伴流传。在西方科学知识大量进入中国以后,这些结伴物常使武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11]。而且传统武术传授一对一的单线条模式,也容易使人对武术产生神秘感和迷信感。为此,精武体育会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一是拳师们身份的转变,以办班形式公开授拳,二是主动融入到学校教育中,到各学校承担武术教学任务。伴随精武体育会社会知名度的提升,各级学校争相竞聘精武体育会武术教员,武术教员主动融入学校教育,如刘振声、张富猷、赵连和及刘振甫曾任教于上海交大^[12],陈公哲赴女子模范团、姚瞻伯赴上海东亚体育学校和上海岭南中学、卢炜昌赴上海爱国女学和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霍东阁赴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广东小学、陈士超赴上海晏摩氏女学和上海崇德女校等^[13]。据《精武本纪》记载,精武体育会早期约有30余名技击教员到上海的各学校或团体教授武术^[13],为早期学校武术教育奠定了基础。

1.2.3 武术传播方式的创新

精武体育会变革的举措之三是在提倡科学求实态度的同时,在武术传播方式上创新。一是著书办刊,1916年8月陈铁生撰“潭腿一路”刊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学生杂志》第二卷第八号,“是为精武会以技击术撰著成书公诸国内之第一次”^[13]。所著书籍及组编教材中以“精武十套”最为著名^[14]。除武术技艺以外,精武体育会同样注重精武精神和武术文化的传播,编辑出版了各类武术书籍,如《精武本纪》、《精武外传》等数十种,据上海体育文史委员会搜集,至1990年,仅上海地区就发现精武书目达63种^[15]。精武体育会还创办杂志、开办会刊,如《精武杂志》、《精武年报》等。二是精武体育会率先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辅助教学与宣传武术。自1916年陈铁生拍摄“潭腿一路”开始,随



后精武教材及出版书刊的相关武术内容大都配有照片,以方便教学^[16]。至 1919 年,精武会拍摄了 5 卷电影,介绍精武体育会的活动,这一做法距电影传入上海仅 6 年时间,称得上是采用了最新的西方科学技术^[17]。三是积极开辟分会,借助分会的集散效应传播武术。自 1911 年开办沪外第一分会——绍兴精武会开始,精武总会先后在国内的汉口、广州、佛山、汕头、梧州成立分会 20 余处,并于香港、越南、星(新)加坡、吉隆坡、成立海外分会 20 余处^[7,18]。据统计,截至 1928 年,共成立分会 42 个,会员约 40 万人^[19]。武术借助分会网络被输送到海内外各地,各分会成为武术传播的集散地。

1.3 武术竞赛体系的初步形成

1.3.1 国术考试——评审方式的近代化

1928 年 8 月 22 日,奉中央国术馆令,上海市在沪北国术总社基础上成立上海特别市国术馆,9 月 9 日改组为上海市国术馆,先后有张伯璇、张岳军、吴铁城等人担任过馆长。馆址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1932 年“一·二八”事变,毁于日军炮火。后迁新开河民国路 83 号,另设教练场 7 处。上海国术馆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要求,组织和编撰出版了大量的武术研究专著和杂志,在推动武术研究、整理和近代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上海国术馆还组织相应级别的国术考试。国术考试是国术馆系统的重要活动之一,根据中央国术馆颁布的《国术考试条例》和《国术考试细则》的规定,国术考试分国考、省(市)考、县考 3 级。“参赛者要按照体重划分为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轻重量级、轻量级五级,借鉴了摔跤、举重、拳击等西方体育活动的量级划分方法,重量单位也是采用西方的磅制。比赛设有裁判员、裁判长,采用回合制,规定得点标准,并在服装、护具方面有详细规定。整个国术考试的过程都借鉴采用了近代西方体育比赛的基本规则和组织方法”^[20]。

1.3.2 武术运动会——竞争方式的近代化

上海率先以运动会形式,促使武术竞争方式的近代化发展。上海对武术传统体育不遗余力地提倡,随着西方竞技体育在上海的发展,上海武术界人士大胆吸纳西方体育竞赛办法,制订武术竞赛规则,建立武术竞赛机制,使武术进入了近代竞技体育竞赛体制。当时上海含有武术内容体育比赛很多,主要如下。

1921 年中华武术会的负责人吴志青,组编由武术基本动作构成的中国新体操、叠罗汉、欢呼等 3 套团体操节目,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演。

1923 年 4 月在上海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中华全国武术大会”,大会设团体和个人表演,分拳脚、棍术、摔跤、剑术 4 科,参加个人表演者有吴鉴泉、王子平、王怀琪、陈子正等武术名家,到会 400 余人,每日观众达 2 000 余人。期间还进行了类似西方的武术学术研讨会。

1928 年举行全国第一次国术考试,考试刚刚结束,借此次国术考试所掀起的国术之风,上海市政府与上海国术馆联合举行“国术运动大会”^[20],“延请各地国术大家及本届首都选拔之武士、壮士到会参加,表演绝艺,阐发中华国粹体育,唤起民众尚武精神……”^[21]。

1932 年第四届上海市民众业余运动会上,国术成为表演和比赛项目,表演项目为国术体操,比赛项目为单拳、对拳、武器、摔角、举重、搏击^[22]。1935 年第六届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办,国术比赛成为正式项目,并设有专门的比赛场地,比赛形式已与西方体育项目没有多大差别^[20]。对于这种新式比赛方法当时很多国术选手很不适应,例如击剑比赛模仿西方击剑比赛的方式,“用皮制之假剑,剑上涂以红土,能以剑触对方而着红者为胜,在比赛时有多数赛员,恒因个人误将自剑上之红色触自己之衣服,而遭失败者”,其中一位青岛选手竟连续“自杀”两次^[23]。1936、1937 年上海还举行第一、第二届儿童国术运动大会。就这样,随着国术之风日盛,国术比赛项目已经进入大型体育比赛之中。

2 上海图书业对武术近代化的促进

2.1 马良《中华新武术》——促使武术教学形式的近代化

随着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西方体育思想和体育教学方法影响扩大,武术家们开始学习并运用西方体育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加以创新融入到武术教学当中。从 1927 年起,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马良的《中华新武术》系列丛书。它标志着武术从军事格斗术和修行术朝近代体育的转型。从此以后,武术开始进入学校,变成了体育学的一部分内容。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时,就对传统武术套路进行研究和改良。1914 年他邀集各派武术专家编纂《中华新武术》一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 4 科。这本书从两个方面对传统武术教学进行了改进:一方面,由单人教练改为团体教练。这本书从风格各异的各种武术套路中提炼出其中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将这些动作衔接起来,能够近似于西方体操,便于分段、分动作操练。另一方面,由言传身教转变为可以图文教学。武术以图文的方式分解教学,改变了传统武术教学只能以师父亲自示范教学的方式,更便于武术活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教学。1918 年经全国中学校长会议讨论,《中华新武术》被列为全国各中学正式体操,在全国推行^[20]。同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议上又决定把它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学校之正式体操”^[24]。

这种创新改变了传统武术单人教授所造成的不易推广的缺陷,开创了武术发展的一个新途径,有利于武术的普及。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鸣。有人批评这种创新是“以个人之一知半解,窃取拳术中数无系统的姿势,编为国技体操,徒求皮毛,全失本意”^[25]。这些批评指出了这场武术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表明武术的革新与发展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马良的《中华新武术》是对传统武术教学的一大改进,但由于其主张“国粹主义”思想而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争论。

《中华新武术》的出发点是以中国拳技和摔跤术的传统武术动作为内容,参照和借鉴“兵式体操”的教练方式,采取中西融合的做法,编成新式武术教练法。1914 年,马良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1919 年秋,《中华新武术》被国会批准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教材。



《中华新武术》并非单纯对武术的复古,也不是盲目地模仿西方的体育手段,它具有创造性,在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中华新武术》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26]。然而,《中华新武术》在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加之马良将其称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并不断被一些封建官僚和“国粹派”教育家所利用,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改革派的激烈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国粹派”教育家陈铁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关于武术问题的论战。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新武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它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武术的研究和推进,成为近代体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26]。而马良的“新武术”等在当时受到批评,主因是其适应了“国粹主义”文化的潮流——袁世凯称帝前后掀起的复古逆流,封建买办势力在“保存国粹”的鼓噪声中,大肆提倡尊孔谈经,力图保持和加强旧文化、旧思想对人们的控制。这股反动逆流也反映在体育领域里,一些守旧分子借口提倡“新武术”和“静坐”(即将维乔《因是子静坐法》),极力推销“国粹”,以抵制新文化运动,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这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必然受到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激烈批判。

2.2 书籍出版物——促使武术传播方式的近代化

上海借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以出版书籍形式促使武术传播方式的近代化。近代上海汇聚了较多武术名家,在推广武术的同时,进行武术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如郭希汾1918年在商务印书馆子弟学校——尚公小学执教,尚公的体育教师庞醒跃创办了东亚体育专科学校,郭希汾被邀请去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兼任体育教员。因当时我国尚无体育史,体育理论教材少,为解决体育教材问题,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体育专著《中国体育史》。

上海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1920—1938年,上海共出版395种体育书,其中介绍武术气功的99种。民族传统体育书籍以精武体育会的出版物最为突出。1918年出版的《精武》,1919年出版的《精武本纪》、《谭腿十二路》、《谭腿》等都以清晰的照片作图介,印刷都较精致,尤其是《精武本纪》使用照片达400多幅,以后成为精武体育会的正史,影响较为深远。此外,王怀琪的2本著作:民国5年(1916年)出版的《八段锦》和民国6年(1917年)出版的《易经二十四式》、马良著的《中华新武术拳脚科》、孙福全著的《太极拳学》都曾得到广泛的流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术气功类书籍,多数为著名武师的著作,如姜容樵的《昆吾剑》、《写真少林棍法》,吴图南的《太极剑》、《太极拳》,孙福全的《太极拳学》,吴志青的《太极正宗》,马良的《中华新武术棍科》,唐豪的《中国武艺图籍考》、《戚继光拳经》、《中国古诀剑法》等都很影响。大量武术书籍的出版流传,改变了过去武术束之高阁、神秘莫测、无法接近、无从学起的状态,人们从了解、熟知,进而争相传习。

2.3 体育报刊——武术近代化传播之新载体

中国近代出现体育方面的专门报刊,始自清朝末年。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报刊至“五四”时期而初兴,到抗日战争前十年而发达。抗战前期,各种报刊陷于停顿状态,至抗战中后期,方稍有起色。但随着抗战胜利后内战的打响,体育报刊最终走向衰微^[27]。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海成为西方近代体育最早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也是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和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渊薮地。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上海先后出现过各类体育报刊多达百余种(含体育特刊和体育专号),其创立之早、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和影响之大,均居中国近代之首,在中国体育报刊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8]。

20至30年代,是上海近代体育发展最兴盛之时,也是武术转型发展之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体育期刊的出版对武术近代化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的体育期刊绝大多数是综合类体育期刊,但已出现运动专项类期刊,表现出国民对一些运动项目的偏爱和西方体育传入的轨迹,譬如,20世纪20年代的运动专项类期刊主要是国术类期刊,这体现了在中西体育融合过程中仁人志士在传承国术方面的不懈努力,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各地相继成立国术馆,随着国术的提倡和发展,国术宣传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上海精武会在提倡国术方面卓有成效,出版了一系列刊物^[28]。

上海精武体育会出版的刊物有:《精武杂志》,约于1920年创刊;《精武画报》,1927创刊;《精武春秋》(季刊),1929创刊;《精武年报》,1929年创刊;《精武从报》,1933年创刊。除精武体育会之外,武术类体育期刊还有以下4种:上海中华武术会编辑发行的《武术》(月刊),1921年创刊;上海扬武国术社编辑发行的《国术》(半月刊),1932年创刊;上海国术统一月刊社出版发行的《国术统一月刊》(月刊),1934年7月创刊;还有由上海市国术馆编辑发行的《国术声》(月刊),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刊。此外还有体育专刊,即就纪念某一具有重大影响的体育活动或者体育社团组织而特别创刊的,武术方面的有:《上海中华武术会第三届征求大会特刊》,1921年发行;《南洋大学技击部十周年纪念册》,1922发行。

3 上海多元化的市民文化生活对武术近代化的引领功用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开始追求享受一定的娱乐活动,体育最初被市民认为是一种洋娱乐方式而被市民大众接受。在上海,体育运动在普通市民中的影响力无疑将随着华人体育事业的发展而走向深入。新型市民群体的形成,市民意识的确立,市民大众对体育的渴求,真正推动了上海近代社会体育的发展。上海多元化的市民文化生活诉求对武术近代化也起到了引领功用。

3.1 武术社团——参与方式的近代化

在精武体育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武术爱好者发起的国技传习所、拳术研究所、中华武术会、南洋大学技击部、上海武学会等武术团体或研究组织纷纷成立。清宣统三年至



民国九年(1911-1920年),上海建有武术团体14个,民国十-十九年(1921-1930年),达25个^[29]。据统计,1910-1937年在上海创建成立的武术团体共有53个^[29]。这些武术团体或研究组织大都以新式会社组织形式组成,改变了传统的开门收徒的封建传习方式,受近代西方体育组织文化影响深刻。武术团体的类别也较为丰富,有的偏重于武术技艺的传播与推广,如中华国技传习所、上海武学会、中华武术会、集精武术团、鉴泉太极拳社、武当太极拳社、汇川太极拳社等;有的偏重于武术的研究与文献的整理,如拳术研究会、武技研究会、中华拳术研究会、国技研究会、中华剑术研究会、中华太极拳研究社、中国内功研究社、中华武当太极拳研究社、螳螂拳研究社等;有的社团明显突出救国强民的目的,如民强国术团、振威武术社、尚志国术社、尚德武术研究社、尚武国术研究社、上海抗日同志救国会、国术界抗日救国会等;有的是学校创办的社团致力于国术的推广,如南洋大学技击部、广肇公学技击部、江苏教育会附设体育研究会国技部、圣约翰大学拳术研究会、良华国术学校等。形式多样的武术社团,可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便于大众广泛地参与武术的传承与发扬。

同时,上海的一些武术团体还把传统武术与近代教育相结合,为了推广武术,培养武术师资,打破武术师徒间单一的传授方式,开办了一些武术类师范学校,如20世纪20年代中华武术会、精武体育会所开设的体育师范学校等。但由于经济原因,以上学校办学时间不长就关闭了。

3.2 体育竞赛表演业——满足市民文化生活多样化的诉求

上海近代的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不断,由于上海的开放性,世界上高水平的球队亦来参加角逐,在上海这座商业化气息较浓的城市,一些体育比赛会收取一定的门票,但民众观看比赛的兴趣蔚然,使得当时的竞赛表演活动比较火爆。这与现代的竞赛表演业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称得上是较重要的体育经济活动。

民众观看比赛兴趣高,1929年10月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各运动场内10月份内举行的各项比赛的观众进行了统计:“以网球最精彩,足球为最热烈,余如篮球田径则寥寥无几,期间或售券,或任人参观,统计有三十余次,参观人数达六万数千,较之上月,殊不可以道里计,足见当时之盛况”^[30]。11月份观众人数“综核观众为28 678人,较之前月,相差将半,盖以足球虽多,精彩不多之故也”^[31]。

1935年10月10日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是日中外参加人员计有10万人^[32],大会第一日门票总计12 300元,“仍有部分购票者未能入内,大会筹委会发出通告凡购得开幕式票未能入内者,十一日可特允入场参观”^[33]。据统计全运会期内,观众超过10万人以上者,共有5天,其中以国庆日为最多,约有18万人,其次为10月18日约有16万人,19日及20日约15万人,13日约10万人^[34]。

随着西方体育在上海的发展,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武术也吸收了西方体育竞赛的办法,制订了武术竞赛的规则,开始采用运动会的方式进行比赛,武术进入了近

代竞技体育竞赛体制。近代上海举办多次大型国术比赛或运动会,各式各样民间的比武活动也盛行。通过比武传艺,国术高手云集沪上,当时的霍元甲就是为比武打擂台而来的。上海曾汇聚了霍元甲、吴鉴泉、陈子正、佟忠义、王子平、傅钟文、王效荣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因此武术的竞赛表演业也很发达。譬如:1928年,上海市政府与上海国术馆联合举行“国术运动大会”。此次武术竞赛进行了商业化运作,票价分六角、二角两种。财政收支方面,聘用专业会计师审计管理。上海第一次国术运动大会结束以后,《申报》刊载了经殷汝骊会计师审查、郑毓秀大律师证明的运动会收支情况,将每笔收支详列于报端,以示管理公正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35]。

4 结语

在近代上海,民间传统武术体育活动仍然不断开展,先后建立了100多个武术团体,抗战期间,武术团体有的自动解散,有的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抗日战争后,民间武术得以缓慢恢复,忠义拳社、中华武术会等一些团体重新成立,同时还新成立了10个团体。由于上海的移民城市的社会特点,上海曾汇聚了霍元甲、吴鉴泉、陈子正、佟忠义、王子平、傅钟文、王效荣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因为上海是中西荟萃之地,各种赛事组织频繁,还以西方竞技比赛——运动会的形式来推广武术、普及武术,起到了良好效果,中西体育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中国拳术较量西洋拳击,不同种体育形式同台竞技,中西体育在交融碰撞中激荡升华。上海较好地做到了中西体育的融合,没有盲目“崇洋”,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上海后,在竞技体育竞赛层面虽然西方的经济体育项目占据优势,但是这些体育形式的发展没有削弱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反而扩充了传统体育的内涵与外延。据上海体育志统计,在上海地区发现的武术拳种竟高达76种101招式,可以说是该时期上海体育蓬勃发展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3.
- [2] 韩锡曾.精武体育会创始人考辨[J].浙江体育科学,1995:49-53.
- [3] 黄佩华.精武体育会成立年代考[J].体育文史,1991(1):55-58.
- [4] 李季芳.霍元甲与精武体操学堂(校)[J].上海体育史话,1990(1):55-58.
- [5] 陈公哲.精武之真精神[A]//陈铁生.精武本纪[M].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6.
- [6] 霍文亨.先祖霍元甲公生卒年考[J].上海体育史话,1990(1):21-22.
- [7] 蔡扬武.从精武体育会看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交汇[J].体育文史,1992(12):5-8.
- [8]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338.
- [9] 肖汝霖.述精武体育会事[J].青年,1916(1):5.
- [10] 陈铁生.精武本纪·补篇[M].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18-19.
- [11] 蔡扬武.从精武体育会看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交汇[J].体



- 育文史,1992(12):5-8
- [12] 章玲苓.领风气之先的交大早期武术运动[J].上海档案,1988(5):54.
- [13] 陈铁生.精武本纪[M].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176, 175-176, 89.
- [14] 方长生.精武十套[J].上海体育史话,1991(2):45.
- [15] 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77.
- [16] 陈铁生.精武本纪[M].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89-94.
- [17] 陈公哲.精武会 50 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37.
- [18] 彭跃清.精武体育会对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11(6):109-112
- [19] 许燕秋.精武第一分会绍兴精武会考[J].上海体育史话,1990,(4):36.
- [20] 于海.《申报》中的我国近代体育研究(1927~1937) [D].济南:山东大学,2009.
- [21] 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与上海特别市国术分馆联合举行国术运动大会,国术大家到沪表演[N].申报,1928-10-26:3(影印本第 251 册 701 页).
- [22] 国术比赛结果[N].申报,1932-10-31:3(影印本第 297 册 777 页).
- [23] 国术场写真[N].申报,1933-10-13:5(影印本第 309 册 402 页).
- [24] 马良.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A]//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8.
- [25] 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67.
- [26] 施鲜丽,蔡仲林.民国时期的武术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影响[J].搏击·武术科学 2005(11):11-13
- [27] 许义雄.我国近代体育报刊目录索引[M].台北:师大书苑,1994:3-9.
- [28] 匡淑平,虞重干.体育文化导刊[J].上海近代体育报刊发展脉络,2009(8):143-146,150.
- [29]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64,70-72.
- [30] 体育协进会运动统计[N].申报,1929-11-01:4(影印本第 264 册 17 页).
- [31] 全国体育协进会十一月份各场运动统计[N].申报,1929-12-05:8(影印本第 265 册 130 页).
- [32] 中外参加人员[N].申报,1935-10-11:3(影印本第 333 册 300 页).
- [33] 大会第一日门票收入可乐观[N].申报,1935-10-11:8(影印本第 333 册 300 页).
- [34] 观众人数[N].申报,1935-10-21:6(影印本第 333 册 587 页).
- [35] 上海国术比赛大会收支清册公告[N].申报,1930-04-12:2(影印本第 269 册 314 页).

(责任编辑:杨圣韬)